

个体与群体：历史视角下铁凝《笨花》的伦理认知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Tie Ning's *Clumsy Flower*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黄子坚 (Danny Wong Tze Ken) 杨迎楹 (Yeoh Yin Yin)
赖静婷 (Lai Chin Ting)

内容摘要：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以 20 世纪中国乡村社会为叙事背景，书写战争与社会转型交错下，个体在历史与伦理张力中的命运选择。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理论基础，从性别身份、道德抉择与共同体结构等多重维度，探讨小说如何建构个体与群体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文章首先分析向喜、向桂与向文成三位男性角色在家国责任与个体存续之间的道德拉扯；再聚焦同艾、顺容与施玉蝉三位女性在妻妾制度中的主体认同与伦理协商；进而讨论取灯、梅阁与小袄子三位青年女性如何在战乱与压迫中实现主体性的觉醒；最后，文章剖析笨花村这一乡土共同体内部的灰色伦理秩序。本文尝试将伦理批评与历史语境结合，借助个体生命故事揭示更宏观的文化与伦理结构，为诠释《笨花》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铁凝；《笨花》；伦理认知；历史视角；个体与群体

作者简介：黄子坚，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历史、中国—东南亚关系与华侨华人史研究；杨迎楹，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汉语与方言、社会语言学研究；赖静婷，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马华文学研究。

Title: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Tie Ning's *Clumsy Flower*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Situated within the transforming landscape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ural China, Tie Ning's *Clumsy Flower* explores how individuals face ethical dilemmas shaped by war, patriarchy, and social change. This paper applie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examine the novel's portrayal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across four dimensions: gender identity, moral choice,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and community life. The first section considers how the male figures of Xiang Xi, Xiang Gui, and Xiang Wencheng struggle to balance family obligations with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second examines the ethical subjectivity of Tong Ai, Shun Rong, and Shi Yuchan, whose fates are defined by the

wife-concubine hierarchy. The third focuses on Qu Deng, Mei Ge, and Xiao Aozi, younger women who experience ethical awakening amid war, desire, and spiritual change. Finally, the paper turns to Benhua village itself, showing how its flexible moral order enables survival while concealing structural injustice. By weaving together personal stories and historical ethics, this study highlights how *Clumsy Flower* reframes questions of ethical subjectivity and moral complex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Tie Ning; *Clumsy Flower*; eth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Authors: **Danny Wong Tze Ken** is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Email: dannyw@um.edu.my). **Yeoh Yin Yin** is Senior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language and dialects, sociolinguistics (Email: yinyinyeoh@um.edu.my). **Lai Chin Ting** is Senior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laichinting@um.edu.my).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与伦理震荡之中。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与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使无论群体还是个体都在历史夹缝中面临艰难的伦理抉择。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正是对这一复杂图景的深刻文学呈现。小说通过笨花村及向喜家族的故事，展现了中国社会在国家危机与社会动荡中的巨大变化。小说描绘了村庄及其居民如何穿越晚清、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揭示了历史如何不仅作为背景，更深刻地介入并塑造了人物的伦理选择与命运轨迹。由于“21世纪的历史书写往往体现出一种对20世纪的‘回返’与‘剥离’（……）所谓回返，表现为以一个现场者的目光或身份重新见证掩藏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审美启蒙大幕下诸种历史情景”（周志强 58）。《笨花》即是回返性历史叙事的典范作品：它以不同现场者（个人、群体）的角度重新见证那些曾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日常伦理场景，在对历史创伤的凝视中，重建个体记忆与伦理感知的空间。时代的激荡不仅塑造了社会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村民的生存路径与伦理取向。从新政失败、清朝覆灭，到民族工业兴起与日军侵华，这些国家大事透过地方的微观叙事，落点在每一位笨花人的生活与选择之中。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在于肯定文学文本拥有伦理性质，旨在从伦理的视角分析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物或群体不同的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

因。¹ 这一理论视角尤其契合《笨花》的叙事特质：小说既未陷入简单的道德二元论，也未回避伦理实践的复杂性，而是结合历史与丰富的人物群像，展现出中国历史巨变节点中的多重伦理面向。

一、历史夹缝中向家男性“家人”与“国人”伦理身份选择

铁凝在《笨花》中构建的向氏家族，在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的剧烈历史震荡下，不断经历着伦理身份的错位与重建。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视角，聚焦人物面临的伦理困境、其伦理身份的建构与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选择。这使我们得以深入剖析向喜、弟弟向桂以及儿子向文成，三人迥异的人生轨迹背后的个体伦理意识。他们的抉择并非简单的忠奸善恶二分，而是其特定伦理身份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与外部伦理环境如国家、民族和家族伦理的激烈碰撞后，艰难平衡或突破的过程。

向家男性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其根源深植于晚清社会结构的崩塌导致的伦理价值的混乱。向喜祖父两代人投考满清武举的梦想，象征着传统的光宗耀祖伦理意识。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导致长期以来的伦理认知失效，构成了向家后代重建伦理身份的困境。

向喜选择从军，这在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乡土伦理中，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伦理选择是人物在特定困境中做出的行为决定。向喜参军并非出于传统忠君报国的崇高理想，而是为了改善家庭境遇，将军职任务视为干活儿。² 这种去崇高化的表述，揭示了他行动伦理的初始内核：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家庭责任履行方式。因此，他的伦理身份首先锚定于养家者，而非传统士大夫或现代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晋升为将军，实现了祖父辈的武职荣耀，但这已剥离了原有的伦理内涵，转变为底层生存逻辑驱动的职业成就。这导致其伦理身份首次出现关键错位：社会地位赋予的国家守护者符号，与其内在认同的家庭支柱实质之间，产生了深刻裂隙，为后续的伦理困境埋下伏笔。

北洋军阀混战的乱局，将向喜推入更为险恶的伦理泥潭。作为直系军阀一员，他的军人身份被迫与不断更迭的政治派别捆绑。他面临的正是典型的两难困境：职业军人身份要求服从命令、效忠所属军事集团，但作为个体，他本能地厌恶无休止的内耗与权谋，内心深处存有朴素的正义感。这种政治忠诚与个人道义之间的撕裂，是其伦理身份中军人角色内部的剧烈冲突。日军侵华带来的严峻考验，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他伦理身份中中国人的属性被强化，与任何形式的对日合作产生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面对日方小坂的威迫利诱，他坚决拒绝为其效力。此刻，其多重伦理维度（家庭支柱、职业军人、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暂时统合，最终走向了拒绝合作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7。

2 本文有关《笨花》的引文均来自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此处参见第48、50、115页等。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的抉择。

然而，这种统合并未解决向喜的根本困境。国共对峙的复杂局面，加剧了他的身份焦虑与疏离感。他不想卷入政治纠纷的回避姿态，深刻反映了其对自身军人身份在政治伦理场域中定位的迷茫与不信任。最终向喜选择彻底剥离政治身份——归隐大粪厂。这一极端行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他通过从事最卑贱的工作进行自我污名化，主动斩断与政治权力、家族的一切关联，以近乎自毁的方式，换取伦理上的清白以避祸保身，确保了其家庭责任的延续。这是向喜的家庭本位伦理在极端压力下的扭曲式伸张，也是其伦理身份错位（拥有将军身份却拒绝政治）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寻求解脱的无奈之举。

向喜并未停留于自我放逐的灰色地带。他伦理身份的最终完成与升华，在于为掩护同胞杀死日本兵而牺牲的瞬间。人物的伦理选择受到其斯芬克斯因子驱动，即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后的结果。¹ 向喜的临终行动，表面看带有军人本能判断的兽性因子（战斗反应），但其内核却是深植于人格中的道义冲动（人性因子）。这种道义感虽在其职业生涯中被“干活儿”的务实逻辑所遮蔽，却从未泯灭。它在保护无辜同胞这一最朴素、最直接的正义需求面前猛烈爆发。“他以儒家文化版图上最鲜亮的色彩挥写了一个大节之士的民族血性与人性尊严（……）他倒在了八年来一直与他相伴的故乡的粪池里”（刘惠丽 31）。他的牺牲超越了自保、保家的狭隘范畴，实现了家庭责任向民族道义的飞跃性升华。其中国人的伦理身份，在生命终点，以最悲壮的方式，与其保护者的本能角色达成了统一。这一行动虽未改变历史洪流，却以个体生命的烛火，完成了其充满错位与挣扎的伦理身份的最终整合。

向桂的形象是向家男性中一个警示性的反面案例。他的悲剧在于，在国家动荡时期，他以家族利己主义对抗国家和民族伦理。这集中体现了在宏大历史叙事下，单一、狭隘的伦理身份认同的脆弱与毁灭性。在家族内部，向桂无疑是合格甚至值得称道的成员。他对兄长向喜充满敬畏，对嫂嫂同艾维护有加，对家族事务尽心尽力。他伦理身份的核心是家族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所有伦理选择都紧密围绕家族的兴旺与体面，比如悬挂向喜军装画像、制作名片套装以炫耀家族地位。这种基于血缘和宗法的伦理实践，在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秩序中或许尚能维持体面。

然而，当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滔天巨浪袭来时，向桂伦理身份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他缺乏国家情怀的意识，不顾及民族尊严。其商人身份所内蕴的逐利逻辑，在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失控。他选择跟日本人合作，大量引入日货植物油灯²，忽视了日本利用经济渗透法的侵略政策。伦理选择必须置于具体的伦理环境中考察其道德属性。³ 在全民抗战、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极端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5。

2 参见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72-275页。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9。

伦理环境下，向桂的选择绝非中性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赤裸裸的伦理背叛与道德沦丧。他将家族利益（实则是个人经济利益）置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尊严之上。向桂的悲剧在于，其伦理身份认知完全固着于逐利的商人和顾家的族人，彻底无视或主动割裂了作为民族共同体一员所应承担的更高伦理义务。

向桂行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植物灯生意最终失败，他被日方利用后抛弃¹。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始终被向家人诟病，成为家族伦理的污点。向桂清晰演示了当伦理身份无法适应历史剧变、无法整合更高层次的伦理（如民族大义）时，个体如何从好家人一步步滑向民族罪人的边缘。他的毁灭，是狭隘的家族利己主义在民族危亡时代必然破产的伦理寓言。他未能像向喜那样在冲突中实现身份升华，也未能像向文成那样在错位后重构积极身份，最终只能被历史巨轮碾过，成为伦理身份单一化与僵化导致悲剧的明证。

向文成是向喜的儿子，他的伦理路径与向喜不同，他经历了另一种形式的错位与重构。童年弱视使他无法继承父亲的军职救国的伦理身份，这迫使他在传统框架之外，重新寻找价值支点和身份认同。他选择投身知识与文化领域，通过自学医术、设馆行医、开设书局和创办新式学校，将自己定位为“乡土社会的启蒙者”与建设者。这种“不入组织更方便组织工作”（293）的伦理实践，牢牢扎根于笨花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需求，体现了极强的建设性。

向文成的伦理身份与选择，核心在于他疏离直接投身政治圈子，选择了坚守社会基础性建设。他拒绝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并非逃避责任，而是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于知识传递、医疗救助和制度改良等根基性工作。他也是八路军后方医院得以建设的关键。另外，他通过法律手段为学校争取失地，这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更在笨花村引入并实践了法治、公共性、公民权利等现代伦理观念。向文成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建设性行动，履行着国家、民族的启蒙功能。他鼓励年轻人参与抗战，而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教育赋予了取灯等青年理解时代、参与行动的知识基础与主体意识。相较于父亲在战场上的搏杀，向文成在乡土进行的是一场更为持久、深层次的伦理启蒙之战。“再也没有比一个乡村医生——身体与生命的守护者，更适合担当乡村日常生活历史的主人公”（王宇 89）是向文成伦理身份最贴切的评价。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建立，成为了笨花村里的精神依靠，塑造了身边可及群体的伦理意识，因此向文成代表了乱世中一种稳健、可持续的伦理力量：立足乡土肌理，以文化滋养和进步的思想改良培育新生力量，为民族未来奠定精神与人才基础。这是对其因残障造成的传统身份错位最成功的伦理重构。

综上所述，向喜、向桂和向文成三人在《笨花》中的命运轨迹，构成了中国近现代转型期乡土男性面对历史巨变时一幅极具代表性的伦理身份抉择图谱。

1 参见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97 页。

二、父权牢笼中向家妻妾的身份困境与伦理突围

铁凝在《笨花》中构建的向氏妻妾，为剖析中国传统父权制度下女性的伦理困境与突破提供了绝佳样本。向喜的三位妻妾——同艾、顺容、施玉蝉，承载着不同使命与理想，呈现出复杂的主体性与伦理冲突。本节聚焦妻妾这一制度性标签所造成的伦理身份压迫与主体认知撕裂，揭示她们如何在父权牢笼的缝隙中，以各自的方式寻求有限的伦理突围与身份确认。三位女性的命运轨迹，正是对父权制度伦理价值体系的接受、协商与颠覆。

在传统宗法社会语境下，妻与妾的伦理身份并非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父权制度与家族利益刚性定义的。这种身份自带一套严苛、不对等的责任与权利体系，深刻规训着女性的身体、情感与价值认同。同艾作为发妻，其伦理身份的核心是宗法正统的象征与家族秩序的维护者。社会与家族共同赋予她贤良淑德、宽容大度、相夫教子的伦理模板。她的价值实现被严格绑定于夫家血脉的延续与家族内部的和睦稳定。当确认向喜另娶汤顺容并育有孩子的事实，同艾瞬间陷入“精神恍惚，昏迷、说胡话”（65-66）的剧烈身心反应。这一细节暴露了父权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结构性伤害，丈夫的背叛不仅是对情感的践踏，更是对她赖以存在的妻子伦理身份的挑战。她的崩溃，是制度性暴力下女性压抑最直接、最惨烈的证明。

然而，更具悲剧性的是同艾后续的康复与升华。在从汉口回到笨花途中，她已然坚强地恢复常态，甚至表现出豁达、厚道的姿态，更把向喜的其他孩子视如己出。同艾舍弃了女性情感表达与对丈夫的质疑权，选择以正妻的伦理身份规范自身，将痛苦深埋。同艾劝扔子同意向桂纳妾时说到：“桂想抱个胖小子”（235）是当时代男人想纳妾的理直气壮的理由，也是父权制度为女性量身定制的服从规则。她以惊人的意志力将这套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严格履行“贤妻良母”职责的伦理实践。她的伟大在于隐忍与付出，但其伦理内核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道德自觉：在婚姻内，通过极致地履行被赋予的角色责任，来换取正妻的尊严与家族的表面和谐。最后她成为了家族不可或缺的支柱，代价则是彻底压抑女性真实的情感需求与伦理诉求，甚至与丈夫同床共枕也会触发神经性紧张¹，显示了其极力在表面上维护的伦理身份，其实在不断迫害她的身心，展现了无法突破父权制度观念下的女性伦理悲剧。

顺容进入向家的开端是一场伦理欺骗。作为向喜在汉口娶的太太，她起初并不知道同艾的存在。她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妻子，享有现代婚姻中的平等和独占权。当得知真相后，她的伦理身份彻底崩塌，无法接受姨太太的身份，并公开指责向喜的欺骗。她的愤怒与反抗，直接揭露了父权多妻制中女性被物化、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的虚伪与暴力。伦理困境源于多重的伦理身份带

1 参见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来的履行伦理义务的冲突。¹此时的顺容，正面临着新式太太所要求的夫妻平等、忠诚，与父权制度强加的妾室身份所要求的顺从、隐忍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伦理困境使她在爆发与妥协之间摇摆不定，充满了身份焦虑。她从汉口返回保定，表面上是拒绝南方生活，实则是对被强加身份的消极抵抗和空间逃离。她在保定自立门户，试图在物理上切断与向家的纠缠，以新式女孩的标准抚养非己出的取灯，并承诺“你跟前的人就是我的跟前的人”（186），这不仅是对自身母亲身份的确认与重构，也是试图在扭曲的伦理关系中，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基于情感与责任的新母女伦理。此时的顺容，展现出抗争又顺从传统女性美德的综合体的矛盾特质，其伦理身份在被欺骗的受害者与尽责的抚养者之间摇摆。

在民族危机的巨浪下，顺容的伦理根基暴露出其脆弱性。当陆先生和日方代表小坂劝说向喜出任伪职时，顺容劝说丈夫妥协，表示“保住性命，保住家室就好”（306）。这句看似务实的话，彻底暴露了她伦理视野的狭隘，将小家的存续置于国家的道义与民族尊严之上。她商人家庭出身带来的实用主义思维，在极端情境下压倒了基本的民族大义。顺容的劝降言论，可能将丈夫推向汉奸的深渊，使家族背负历史污名。向喜第一次打她²，是愤怒，更是对她伦理底线失守的震惊与绝望。这两个耳光，打破了夫妻间脆弱的平衡，她最终拒绝随夫返乡，孤死保定废墟。象征着一个在伦理夹缝中摇摆不定，最终被时代与家庭双重抛弃的灵魂。她的悲剧在于，既未能彻底挣脱父权的枷锁，也未能建立起足以支撑乱世生存的、稳固的更高价值信仰。

施玉蝉是向家成员里的一道叛逆传统伦理的异色。她本是瓦尔斯班走钢丝的名伶，象征着流动、技艺与公共空间的可见性，这与深宅大院的同艾和顺容截然不同。向喜被她吸引而纳其为三房，这本身就颠覆了传统审美。然而，施玉蝉从未认同或内化妻妾的伦理身份，嫁入向家对她而言，更像是命运的一次偶然停泊。她不参与家庭地位的角逐，从一开始就拒绝被传统的妻职规范所定义。

女儿取灯的诞生，短暂地将她拉入母亲的角色，却也迅速引发了强烈的伦理身份危机。进入婚姻三年后她变得情绪消沉，根源在于其生命本质与伦理角色的根本冲突。她向向喜坦言：“我想回老家搭班子，不走我活得难受”（183）。她将自己比作必须“翻跟头”而非“回去”的黄帝使者，点明了杂技生涯才是她生命意义与快乐的源泉，被禁锢于家庭无异于精神死亡。

在传统伦理中，抛夫弃女是惊世骇俗的背弃。然而，这却是施玉蝉基于清晰自我认知做出的一次负责任的伦理选择。她忠于自己生命的价值与自由，深知在压抑中无法成为合格的妻子或母亲，强行留下只会造成更大的情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258页。

2 参见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感伤害。因此，她将女儿取灯郑重托付给向喜，希望孩子能在更平稳的环境中成长为闺女，而不是走江湖的人。这一举动体现了她即使放弃了亲自抚养女儿的机会，也仍然关注下一代成长与教育的伦理责任感。施玉蝉逃离家庭，象征着一一次积极的伦理突围。她挑战了父权制将女性固化为生育和家务工具的本质。她的选择证明了，女性作为独立的伦理主体，拥有定义自身价值与存在方式的权利。她的选择，映照出同艾的压抑与顺容的摇摆，展现了女性在父权制度下追寻自我实现的伦理选择的可行性。

总的来说，同艾、顺容、施玉蝉三位女性在《笨花》中的生命轨迹，构成了父权制度下女性伦理困境与突围策略的三种典型范式。

三、战争中青年女性的伦理觉醒与死亡悲剧

《笨花》中的战争背景深刻考验了三位青年女性——取灯、梅阁与小袄子的伦理身份和选择。她们出身与天性迥异，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探索全新的伦理身份与生命认同。然而，身份的觉醒也带来了更深的伦理困境。最终，她们以各自的死亡，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伦理选择，展现了年轻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艰难与多元。

取灯的伦理身份建构，是多种现代性力量共同塑造的产物。她的身上，既有生母施玉蝉追求自由的天性，也融入了二妈顺容新式女孩的精心培育。更为关键的是，向文成带给她的现代启蒙教育，为她注入了开阔的视野、独立的意识与强烈的行动力。这一系列影响，促使她完成了从向家掌上明珠到自觉的八路军党员的身份蜕变，这是她伦理身份觉醒的核心标志。初到笨花村时，她选择称呼同艾为“娘”，这一声称呼并非简单的乖巧，而是基于深刻伦理认知的情感策略与责任担当，展现了她早慧的社会适应能力。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取灯找到了个人价值与家国命运的最佳结合点。她投身于乡村夜校的教育工作，并积极组织抗日活动，将个人才华完全奉献于时代洪流。当革命组织向她发出脱产邀请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脱产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莫非除了抗日，目前我还有别的前途可言吗？”(383)这句宣言标志着她作为革命者伦理身份的彻底确立。自此，她的最高伦理责任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上升为为民族存亡而奋斗，乃至不惜牺牲生命。

然而，革命伦理的确立也带来了个体亲情与集体道义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构成了取灯最核心的伦理困境。小说细腻地描绘了她投身革命前对家庭的深深眷恋与牵挂，揭示了宏大的革命奉献与日常的亲情守护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这一困境在她最后的选择中被推向了顶峰。在南岗窝棚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取灯并未因小袄子迟迟未到而立即撤离，反而在危机四伏中沉浸于星夜之美，回忆家人，想着大哥跟他说起灯笼鬼儿的原理。¹这种情绪的留驻，反映出她对平静生活的深切眷恋，揭示了其内心的伦理矛盾。在明知若被日军

1 参见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77-479页。

俘虏将面临严酷折磨的情况下，她仍选择优先尽力杀敌，而非及时自尽。她第一次延误，是因对朴素生活的留恋；第二次延误，则是在自我安危与革命道义之间的终极对决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在南岗窝棚的惨死，是其自觉伦理实践的逻辑终点与升华。她的牺牲并非一次被动的受害，而是一次清醒、主动的伦理抉择，以最悲壮的方式完成了革命伦理对家庭伦理的超越。那具血肉模糊的遗体，以及手中紧握的、象征着知识启蒙与精神传承的钢笔，共同构成了一个永恒的意象，凝聚了她所有撕裂性的困境与最终的崇高选择，使她成为那个黑暗时代最为明亮而庄严的伦理模范。

与取灯在世俗革命中寻找价值的路径不同，梅阁的伦理身份觉醒指向了一个完全超越世俗的维度。在笨花村的传统伦理秩序中，梅阁始终是一个异类，她的孤独源于其精神世界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当她初次接触《圣经》后，便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拥抱了上帝选民这一全新的伦理身份。这次相遇彻底重构了她的价值体系与责任归属，为她提供了一个足以对抗整个世俗世界的精神支点。她对信仰知识的渴求和不容置疑的虔诚，鲜明地体现在她对取灯质疑献子故事时的严厉反驳中。在梅阁的世界里，伦理义务的对象不再是家族、乡土或国家，而是唯一的、超越性的上帝。这种全新的身份认同，赋予了她巨大的勇气，使她能够以拒绝服药的方式对抗祖父的世俗关怀，以坚持受洗的决心挑战家族的权威。梅阁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笨花村根深蒂固的乡土伦理秩序的一次静默然而彻底的颠覆。

梅阁的伦理困境，在于生物性的生存本能与超越性的宗教信仰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她身患肺结核却拒绝服药，坚持要靠主而非人为的疗愈，这是她日常生活中信仰与生存的对决。当日军屠村的灭顶之灾降临，这一困境被瞬间推向极致。在人人逃命的求生本能支配一切的时刻，梅阁却做出了与所有人背道而驰的选择。她平静地走向屠杀者，这种看似消极的散步，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主动和清醒的伦理实践，是将其肉体生死完全交托于信仰至高法则的终极行动。她的死亡，是其信仰伦理的最终完成，也是其主体性的最高确认。她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掌控了自己的结局，主动走向了信仰所许诺的永恒。枕头下的箴言“天国近了，时候到了”（395），是她对这一选择的预先宣告。对她而言，死亡并非终结，而是通往天国的门径。她面对死亡的异常平静，成为了其信仰真实性与力量的最强见证。梅阁的殉道，在凡俗世界之外，为自己树立了一座纯粹的精神丰碑。

与取灯和梅阁不同，小袄子的伦理身份始终处于一种模糊、流动且从未被稳固建构的状态，不断沦陷于欲望困境。她出身不明，成长于村庄的边缘空间，长期被主流社会标签化、污名化，是一个彻底的他者。这种被压抑的边缘者身份，使她对身份认同与社会归属感产生了近乎病态的渴求。由于缺乏其他途径，她将身体与情欲当作确认自身存在与获得外界认同的工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对地痞金贵那种扭曲的、自我作践式的依恋上。

小袄子的伦理困境最为混乱与绝望，她始终未能在内心确立一个稳定、自洽的伦理身份，而是在汉奸的情妇、被启蒙的学生、革命的同情者等多个碎片化的角色之间痛苦地摇摆。上夜校带来的启蒙新思想，曾一度让她尝试通过学习，将自己重塑为一个进步青年，摆脱她“有魔鬼牵着她往地狱里走”

（408）的淫乱行为。然而，这一脆弱的伦理觉醒，因缺乏坚定决心与真正的伦理自觉，在现实的重压（被捕、利诱）与情欲的牵引下迅速崩塌。被捕后，求生的原始欲望轻易压倒了对民族大义的模糊责任感，导致她迅速接受收买；对金贵的迷恋，使她一步步滑入汉奸的圈子，当金贵要求她出卖取灯时，情感依赖、姐妹情谊与背叛的恐惧在她内心激烈冲突；取灯惨死后，她虽深陷良心的煎熬，却又天真地试图通过幻想一桩世俗婚姻来逃避罪责与精神痛苦。¹她在试图重新获取信任时，却又本能地诉诸于低级的色相引诱西贝时令，再次证明她已丧失建立有尊严的伦理身份的能力。她的每一次抉择，都像是被当下最强的外力所裹挟的随波逐流。虽然小袄子的命运也可被看做“自然人性被压抑的女性悲剧”（商越 84），但她的死，既是她背叛基本人伦道义的惩罚，也是伦理身份建构失败的悲剧。

综上所述，取灯、梅阁与小袄子以她们短暂而炽烈的生命，在《笨花》的伦理场域刻下了三条截然不同却又相互映照的轨迹。这三位年轻女性生命的陨落，揭示了伦理选择与生命终极价值的本质。

四、乡土共同体中弹性与暴力的灰色伦理秩序

铁凝在《笨花》中，将笨花村塑造为一个在历史剧变中依然有效运作的地方性道德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伦理秩序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呈现出高度的情境化与实用主义色彩，形成了一片独特的灰色地带。其内部运作依赖一种情一理一势的动态平衡机制，既通过弹性的非正式契约维系日常运转，也在危机时刻暴露出其复杂甚至残酷的一面。

笨花村的经济伦理体现了这一灰色地带，首先在鸡蛋换葱这一日常交换模式中。由于村民普遍缺钱，以物易物的机制应运而生，这本身就是对僵硬货币经济的一种务实突破。交易过程中，妇女们在交割鸡蛋后顺手多拿一两根葱叶的“白饶”行为，以及卖葱人经过象征性阻拦后的默许，构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互惠关系。这种非正式契约的维系，不靠法规，而依赖于共同体成员对情面与分寸的共享理解。其弹性边界在于，这种顺手行为被默认为小额、非系统性的。当卖葱人逐渐演变为像专收鸡蛋似的，说明这种最初的权宜之计已在长期实践中固化为被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成为维系社区经济稳定不可或缺的纽带。

在笨花村里另一经济交易钻窝棚，是女性夜间进入棉花地窝棚以身体换取生存资源的活动，这一习俗本质上是贫困女性的一种生存策略。小说里的

1 参见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84页。

描述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判，呈现出多维度、有弹性的伦理秩序。首先，这种交易常常超越纯粹的肉体关系，掺杂着情感补偿的复杂性。例如，大花瓣儿在言语冒犯向桂后，会主动以额外服务来弥补；而向桂则会将优质的洋花特意留给她，显示出非经济利益的人情因素。其次，这一习俗内部存在着自我调节的潜规则。无论是大花瓣儿在拿到半包袱棉花后试探性地询问向桂“你不嫌我抓得多吧”（82），还是小妮儿依据“头一回可以多拿点”（86）的默契，都表明参与者对行为的边界有着共同的认知。

在钻窝棚现象中最具伦理分析价值的，是向桂与涉世未深的小妮儿的情节。在交易即将达成的一刻，向桂因对女孩的怜悯而中止了行为，反赠十块大洋劝其离开，并最终选择迎娶她。这一关键的抉择，完美印证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即人性中的道德良知（人性因子）最终压制了本能的生理欲望（兽性因子），构成了一个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典型的道德自律案例。¹ 笨花村的乡土伦理共同体通过默许这类风俗的存在，在满足底层个体的生存需求与维护整个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而务实的妥协，充分展现了特定历史情境下，地方性秩序伦理的复杂性。在《笨花》中，地方信仰、风俗与集体行为并非纯粹的文化风景，而是深嵌于伦理结构中的实践形态。乡土共同体所维系的伦理体系，一方面构筑了个体与群体间的价值纽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排异性、暴力性与结构性不公的内在伦理矛盾。

笨花村的宗教信仰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伦理特征。村民供奉的火神、水神、三皇姑等地方神祇，强调的是现实效用而非超验信仰，其祈愿目标集中于防火、求雨与祈子等生活所需。这类功能性信仰构成了一种生存伦理：个体借助祭祀仪式，尝试掌控自然与命运的不确定性，从而缓解生活的焦虑。年度的火神庙会不仅是对神灵的敬奉仪式，更是共同体进行伦理重申与归属确认的集体行动，体现了一种趋利避害、保境安民的实用伦理意识。这种地方伦理的积极功能，在稳定社会秩序、凝聚社区认同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信仰逻辑，当遭遇突发危机与极端压力时，极易转化为伦理暴力的工具。小说中活犄角事件即揭示了共同体如何将信仰伦理异化为驱逐与惩戒机制。面对突如其来的雹灾，村民未尝试追索自然灾害背后的科学解释，而是迅速断定灾祸源于活犄角这一边缘人物，将他们全家驱逐。该事件暴露出乡土伦理系统在集体恐慌中施展的集体伦理暴力：对个体的牺牲被视为恢复安全的必要条件。活犄角的女儿元庆媳妇企图隐瞒身世不果后，终身都在歧视的阴影下度过一生²，正是体现了以集体安全为最高伦理准则、牺牲个人权利的可怕之处。

同样显见的伦理封闭与文化排异，还体现在笨花村村民对基督教伦理体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5-6。

2 参见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84页。

系的抵制上。当瑞士传教士山牧仁夫妇将基督信仰带入村庄时，超越血缘等级、现世功利逻辑的宗教伦理观念，对地方伦理秩序构成了直接挑战。村民对传教士语言、行为的歪曲与嘲讽，暴露出地方文化通过贬抑与他者污名化来维系伦理边界。其本质是村民试图拒斥新的文化入侵，保护既有文化伦理的防御策略。更直接的伦理张力出现在个体面对两种伦理体系之间的冲突时所做的抉择。梅阁的信仰转向标志着她对地方伦理规范的出走与重建。祖父西贝牛误会受洗视过程将使家族蒙羞，“除非梅阁不是西贝家的人”（241），实则反映出在传统家族伦理中，身体不仅是物质存在，更是伦理控制的载体。她宁愿承担与家族决裂的危机，也要皈依上帝，这种从家族伦理向信仰伦理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伦理身份的重塑。在她眼中，灵魂的归属权高于身体的血缘责任。梅阁的抗争，揭示了在地方伦理中，个人欲取得自主权，往往必须经历一场脱离家庭、背离集体规范的伦理断裂过程。

笨花村维持的伦理秩序带着灰色地带，其看似包容的弹性表象之下，实则存在深刻的结构性不公。这一伦理机制表面上倡导灵活与人情，但其实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默许性剥削与边缘化之上。

结语

铁凝的《笨花》通过一个小村庄与向喜家族的故事，展现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在国家危机与社会动荡中的巨大变化。小说涵盖从清朝灭亡到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时期，揭示了历史如何不仅作为背景，更深刻地介入并塑造了人物的伦理选择与命运轨迹。

向家三位男性体现了他们在家国夹缝中的不同抉择路径：向喜从军为生，后避世隐居，最终为保护同胞而牺牲，折射出家庭责任与民族大义的伦理冲突；向文成以行医、办学服务乡里，在无法参军的条件重建知识分子的责任认同；而向桂专注家族利益、与日人合作，最终遭到家族与社会的排斥，呈现出忽视国家伦理的个人悲剧。女性角色则揭示了在父权体制下的多样伦理实践。三位妻妾：同艾、顺容、施玉蝉，分别选择忍让、抗争与出走，展现了不同的生存智慧与牺牲。而青年女性如取灯、梅阁、小袄子，则在战争与信仰之间作出各自的生命决断：取灯为革命殉难，梅阁为信仰宁静赴死，小袄子则因价值混乱走向毁灭，这揭示了伦理主体性的差异及其代价。此外，小说对笨花村灰色地带伦理的描绘亦颇具深意。乡村社会以灵活、实用为核心的生存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秩序，却在面对危机时也可能转化为排斥机制，如活犄角事件中集体对边缘者的驱逐、对基督教的排异，暴露出乡土伦理的双重性。

总体而言，《笨花》不仅是一段民族历史的深情书写，更是对人性伦理可能性的深刻勘探，描写个人与群体在历史巨变中的伦理抉择，展示了国家、民族、家庭与个体责任之间复杂而真实的伦理张力。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强

调的：“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判：基本理论和术语》17）。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笨花》中人物在国家灾难、制度崩解和文化裂变中的伦理困境与抉择。

Works Cited

- 刘惠丽：“‘理想人格’与铁凝小说——以《笨花》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2021）：27-32。
- [Liu Huili. “The Idealistic Personality of Tie Ning’s Novels: A Case Study of *Stupid Flower*.”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21): 27-32.]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商越：“男权和革命夹缝中的悲剧命运——论《笨花》女性形象”，《安阳师范学院学报》1（2016）：82-85。
- [Shang Yue. “Tragic Fate between Patriarchy and Revolution: O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Clumsy Flower*.” *Journal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1 (2016): 82-85.]
- 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 [Tie Ning. *Clumsy Flowe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王宇：“日常生活精神与医疗、疾病书写——《笨花》新论兼及新世纪女性历史叙事新动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7）：80-89。
- [Wang Yu. “The Spirit of Daily Life and Medical Care and Disease Writing: A New Look at *Stupid Flower* and New Direction for Femal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New Century.” *Journal of Nank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17): 80-89.]
- 周志强：“重写‘20世纪’——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与文体形式”，《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008）：53-60。
- [Zhou Zhiqiang. “To Rewrit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Style of Rivel Novel in New Age.”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 (2008): 53-60.]